

语 言 与 传 播 丛 书

YUYAN YU CHUANBO CONGSHU



应用语言学 前沿问题

◎ 于根元 /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

于根元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于根元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1

(语言与传播丛书)

ISBN 7 - 5017 - 0963 - 7

I. 应… II. 于… III. 应用语言学—研究 IV. H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516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苏耀彬

电话 (传真): 010 - 6835 - 4197

个人主页: <http://fbshs.top263.net>

E-mail: cephs@economyph.com suyaobin@126.com

bianshensyb@yahoo.com.cn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白长江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印张: 9.875 字数: 227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17 - 0963 - 7/G · 162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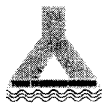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53507 68308640 68359420 68309176

作者简介

于根元，男，祖籍江苏泰兴，1940年生于上海市。1963年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了21年，在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了14年。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应用语言学系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王蒙小说语言研究》（大连出版社，1989，同刘一玲合作）、《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主编）、《网络语言概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主编）、散文集《语言是大海》《唤醒语言》（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2004）、《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主编）、《中国现代应用语言学史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主编）。



于根元



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

——代前言

于根元

1992年我国应用语言学学科开始建立，我国应用语言学理论研究就很活跃。我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应用语言学理论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提出了一些见解，也带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生，估计这些研究生里有的会有后劲。我自己来部分解读这个现象，也是讨论应用语言学的队伍建设。我自己作为研究者来研究这个现象，这个角度可能也有新意。所以，把我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也请来听一听。

一、我在创新和理论方面受到很多影响

我在上海人文初级中学念的初中。那是个不怎么样的初中，但是有不少好老师。我记得教我们历史的朱国璋老师，上课的时候常常引述《历史研究》还是《历史学刊》上的见解。我们还是十二三岁的孩子，老师很尊重我们，给我们说前沿的不同的学术见解。

高中更是这样了。我在上海五四中学念的高中。那是很有名的中学。我在1958届6班。班上的同学聪明极了，多才多艺。整个学校很活跃。电影《雾都孤儿》里的小女孩，是我们同学配音的。电影《街道足球队》，有我们的同学当演员。演相声，我们同学在市



里拿奖，在电台里演出。篮球，在市里警备队、交通大学都参加的比赛中得前几名。

老师也鼓励我们创新。我记忆深刻的有这样三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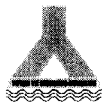
一件是1955年，我刚上高一。语文老师刘田生准备讲《小二黑结婚》，要一个同学先创造性地讲一下课文。老师叫我讲。我离开课本，讲得很生动，同学听了前仰后合。结果，老师给了我90分。那时候我们像这样的考核几乎都是拿100分的。同学们对给90分很惊诧，我也惊诧。老师说“创造性不够”。老师给我们做了个简要的示范，课文时空大变位。我听了真是服了。后来，我总努力说得跟课本上的、老师说的不同，努力有创造性。

还有一件事是在高二的地理课上。蔡家龙老师要我回答问题。我又努力说得有创造性。老师先不给分，要同学们评论一下。同学们争论开了。结果，老师充分肯定了我的创造性，给了我高分。我努力创造了，老师看得出来，他们很高明，他们保护和鼓励我的创造。

第三件事是高三，还是高一的那位老师上语文课。我特别是语文学得好，老师提难答的题才叫我。老师叫我回答元杂剧产生的原因。我又创造性地回答了。老师说回答得很好，但是他又说高考的时候不要这样回答，高考不要标新立异。他又做了示范，第一什么第二什么，完全是八股调。后来我知道了，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你创新的，不是什么人都知道你是在创新的，不是什么时候什么人都保护和鼓励你创新的，碰到需要你创新的时候你创新，不要你创新的时候你也得会说八股。不过，我能不说八股的时候不说八股。我经常采用这样的方式：形式上像老一套，骨子里有许多创新。

我还参加上海青年官举办的文学讲座。免费的，还发铅印讲稿。我听过许杰、顾仲彝、蒋孔阳、赵景琛一大批大作家、大文学理论家的讲座。

我的大学五年，基本上也是在思想活跃的氛围里度过的。



一进大学，就遇上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不过情况还好，领导是做样子的，时间又短。歪打正着的是我们在学术上并不那么盲从，善于独立思考。

后来学术活动很多。老师的学术讨论会我们都可以参加。郭维森关于古典作品的作用是扩大还是缩小的文章，老师开学术会议争论，很激烈。系领导的学术思想很活跃，经常给我们谈很有创造性的见解。年轻老师跟我们座谈怎么学习。很有名的罗根泽教授跟我们谈怎样读书。

我们学生也有很多学术讨论活动。我参加讨论过白居易的闲适诗、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等。

后来方光焘先生主持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那是我国语言学理论的一场大讨论，还请不同意见的高名凯来做报告，我们都是听了的。后来，方光焘先生还专门给我们开了一学期关于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课。陈望道从北京回上海的途中来南京，做了几场报告，还跟南京的许多学者开过一次会，会上方光焘先生要求允许派外有派，我们都在场。

南京大学一毕业，我就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语言研究所，我的工作部门是学术研究部门，当然是很讲创造和理论的。文革当中，在干校的后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还细细读了不少马列的书。

二、我也参加了许多这方面的实践

大学里我也受了洪诚先生许多朴学的影响。洪诚先生也是思想很活跃的，但是朴学方面突出一些。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敦煌变文“是”字用法分析》（《中国语文》1965年第4期）是洪诚先生指导的。我写了许多札记，许惟贤先生辅导，洪诚先生指导。他们批改我的札记。我无数次到洪诚先生家里去接受指导。我在南京大学受到思想活跃、注重理论和朴学几个方面的熏陶。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学风是很严谨的。我在《中国语文》编辑部工作了21年，受到很严格的训练。我在语法、修辞、语言学理论等方面有过科学研究的实践，还在推广普通话等方面到第一线做过比较深入的调查。

在《中国语文》编辑部的训练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是敏感，有学术的新闻敏感性。《中国语文》处在语言学的前沿，编辑部的同仁谁发现了语言学术有价值的动向，经常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大家会及时讨论。

第二是知道取稿的标准不是自圆其说。研究当中有问题、有不妥，要实事求是地摆出来，不要回避，不要掩饰。取稿的标准也不是编者同意某种说法，也不是稿件里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重视的是有价值的新见。

第三是高效率。我们要组稿、审稿、加工、校对，工作很忙。校对就是三次，还要下厂核红一次。什么时候什么稿子送厂，什么时候什么稿子从厂里取回来，是有个严格的日程表的，绝对不允许耽误。我们还有许多别的工作。我们自己的科研，靠平时积累、思考，抓零星时间写。五一、国庆、过年，几天工夫就出来一个论文初稿了。没有人压我们，我们是很自觉地高效率。高效率成了习惯，就像许多农民不干活就难受。

第四是严谨和活泼的学风。学术空气很民主。学术空气就要民主，不民主就不是学术空气。说老一套就不是学术。我自己说新见，人家喜欢我说新见，我也喜欢人家说新见，新见当然就是不同于原来的见解。

语言所很重视培养年轻人。1964年我从山东龙口北马北村劳动实习回京就当了一次值班编辑，苏培实帮我轮值。张朝炳比我大十几岁，手把手教我当编辑。文革以后，饶长溶也到了编辑部。在各种场合，我发言，他就对我会心地微笑，鼓励我。后来我自己发现我说的里面有很多是错的甚至是很幼稚的，饶长溶的学问那么大，



他当然知道，但是他鼓励我说自己的见解。后来我为主编辑《语言教学问题》（中国语文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为主编辑《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主编《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张朝炳很勤劳很谦虚地协助我，接受我的指挥。我也勇敢地指挥他们。我知道他们期望的就是我能指挥他们，他们鼓励我指挥他们。

杨耐思是研究中原音韵和八思巴字的大专家，他常常帮我改稿子。我常常到他家里去。哪里是他帮我改稿子啊，常常是我不同意这么改了，他要千方百计说服我，或者共同想一个好的说法来，或者是他同意了我的说法。

吕叔湘先生既是所长又是《中国语文》的主编。我很敬重他。有一段时间语言所在北京地质学院，我跟吕先生的家在永安里隔一条马路，编辑部有些事情让我找吕先生。但是我过年过节或者别的时候一般不去问候。吕先生对我的批评也很多，但是批评到位，我很服气。他在背后常常说我好话，说得也到位。我喜欢吕先生，他当面批评我，背后表扬我。我喜欢这样的人。后来我想：对于正直的人，你有什么必要去拍他马屁呢？对于不正直的人，你又何必去拍他马屁呢？主要的是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语言所的许多学者对下很宽容。对权威敢提意见。有一次编辑部开会，张朝炳对吕先生提意见，跟吕先生你来我去争论起来。我好几次看到语言所的学者对权威提意见很激烈的。

我受了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我一方面很宽容，特别是对年轻朋友。《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说周瑜设计取荆州，以为诸葛亮中计，大笑曰：“原来今番也中了吾计！”（4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后来发现失计，第五十七回里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他没有找对原因。为什么老天爷生了周瑜就不能生诸葛亮呢？周瑜宽容些不行吗？我尊重年轻的朋友，不是一般的进化论，是我推崇鲜活，希望不要僵化，认为一个人不是一个方面好了各个方面



就都好，认为一个人不是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当了博导了就方方面面都是博导。还有就是选优，包括向年轻的朋友学习。我另外一方面是讨厌霸，特别讨厌欺负小字辈的霸。不过，这方面我也有了进步，不是一遇到我有不同意见的权威就提意见。有的权威或者够不上权威的不喜欢听不同意见，我就不提意见。本来嘛，人家不喜欢你提意见，你何必去提意见。

1984年10月，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建立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后来归国家语委，现在归教育部。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14年，我在新词新语、语言规划、社会用语规范、广告语言等方面都做过比较深入的调查。1994年到1996年担任《语言文字应用》主编，组织了关于语言观的大讨论。

1998年底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到现在也快7年了。我总想不丢掉原来国家队队员的水平。国家语委和有关方面的活动我参加得不少。有关的学术讨论会、规划会议、评估活动、课题，能参加的都参加。我离开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时候跟国家语委的负责人说过：国家语委需要我做的事我会努力做。我兑现这个承诺。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这几年，便于我学术上滚雪球出成果和带了一些包括应用语言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生。

三、平民情结

这是解读我的一些理论认识和散文和生活态度的又一把重要的钥匙。

我出身低微，家境贫寒。我1945年跟祖母、姐姐到苏北泰州乡下过了一年，还在那儿读了私塾。我和乡下的孩子在一起。我后来几次下乡。大学里几次去江宁县湖熟公社劳动。1963年10月到1964年9月在山东龙口北马公社北村一年。1965年10月到1966年6月在江西丰城先是石滩公社李家大队后来是桥东公社江下大队社教、劳动一年。特别是1963到1964年在龙口北马公社北村的一年。



我一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不久，哲学社会科学部新来的大约八十个大学毕业生就到北马公社劳动实习一年。我们语言所同文学所是第一小队，哲学所、近代史所是第二小队，两个小队在北马镇。起初是劳动，后来分到各个大队帮助搞社教。再后来语言所的人回到北村大队劳动。我一直留在北村大队。这个大队有九个小队，一千多人。社教期间和后来，我主要做大队青年工作。前期我住在朱玉璋家，后来住在张茂田家了还是常常去朱玉璋家串门。我一直想着他们和那儿的朋友。我在一篇散文《尝鲜》里说：

我离开北村以后三十八年了一直没有回去过，可是心里一直惦记他们。我惦记那里河滩边的花生地，我惦记那里夜校的年轻人，我惦记那里冬天的吕剧演出。朱玉璋大我差不多十多岁，是我的大哥，大哥大嫂现在还健在吗？他们的孩子，我记得叫朱本玲、朱本英，还有小名叫秋忙的，你们都好吗？（《语言是大海》4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2005年4月15日我总算去了。朱玉璋早去世了，我看到了老嫂子，看到朱本英。他们也牵挂我。我们现在一直有联系。6月7日镇党委书记孙新河来了，他先去了我房东家，他捎来了我老嫂子的话，说是要我就把她当成我的老姐姐。

我生在上海，读大学在赫赫有名的南京大学，工作在北京，都在大城市。我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据说在古代相当于翰林院。我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两度当副所长，相当于副厅长级，级别也不低了。但是，我的骨子里有平民情结、农民情结。我天生是个山野之人。

我总想，有一种平民原来是田舍郎，一朝登入天子堂，一有钱和权脸就阔。有的上层人有平民情结，英国王室不是有娶平民为妻的吗。

还有，似乎说中国平民敬畏大人物或者大一些的人物。这也不



一定。我这一次看我的房东，他们不因为说我是北京的专家就跟我生分。他们近来几次给我来电话，都直呼姓名。他们一直关心着我，想着帮助我。

我在北村一年，有个深切的体会：我们说人民、农民，不是抽象的，就是我的这些朋友。那时候我就下决心，我今后说话做事要很自然地想着让他们高兴。

我的理论认识里讨厌大欺小，讨厌霸道，讨厌贵族派头，讨厌瞧不起老百姓的语言，讨厌话语权在少数人手里，从这里可以得到解读。

我的散文里尊重小保姆，尊重售货员，喜欢牛郎织女、鱼姑娘、田螺姑娘，对不许牛郎织女长相守的王母娘娘不满，从这里可以得到解读。

我希望我的散文平民化和大气。我有平民、农民情结，我觉得踏实，所以才可能大气。

去北村那天上午，烟台师院的吕永进先陪我和妻子到张炜的万松浦书院。张炜到省里开会去了，张炜的秘书王东超接待我们。后来跟我通过不少信的张炜的好朋友王美盛也来了。王东超和王美盛问我为什么要去北村看看，我说了缘由。他们感叹地说这是我的财富。他们下午都陪我到了北村。一来他们在一带熟悉，要为我找到房东出一臂之力。二来他们也希望看看这难得的场面。我理解他们说的财富，不是说我有过这么一段经历，而是说我有这样的情结。这引起了一些缺乏这样情结的人的赞叹，引起了一批有这样情结的人的共鸣。

四、做了新词新语的整理和研究

这是我在理论方面有了比较多的认识的开始。研究新词新语，碰到一系列的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许多理论问题。

例如，说语言越稳定的越规范，新词新语是“风”“流星”



“昙花一现”。

例如，说汉语普通话里有了“出租汽车”，为什么要用“的士”。

例如，说：“一个新的语言现象，等它用的人多了，用的时间长了，我们来追认它是规范的，这就是规范工作。”说规范都是滞后的。

例如，说语言里不好的东西寿命短，会自然消亡，有价值的自然会长期留下来。

我们发现，这些说法的理论，差不多都跟索绪尔、斯大林的某些语言学理论有关。我们不得不审视索绪尔、斯大林某些有关的语言学理论。我们提出或者发展了关于语言内核外层互补理论、交际值理论、新颖度理论、预测观、规范就是服务、积极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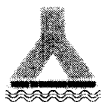
新词新语是新东西，研究新东西就会碰到许多新问题。这几年新词新语的讨论是很多语言问题讨论的汇集，新词新语的讨论成了语言观更新的排头兵，我们有幸研究了这个问题。

五、读了《宇宙全息统一论》

我1994年细细读了王存臻、严春友在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这本书。

这实在是一本好书。我读了之后知道，原来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尤其是哲学家，从老子到恩格斯、列宁，对事物、信息的潜和显都有极大的兴趣，都有许多论述。我从中得到启发，在王希杰的基础上主要加上色彩，提出语言始终处在潜和显的过程之中。我们不同意语言产生和消亡的说法，提出或者发展了语言喷泉说、语言是个开放的梯形结构说、主体客体语言说。

在这前后我还提出或者发展了语言巨系统和惯性说，语言创新能力说，占位挤位说。我还认为理论是一种修养，不重视理论上也是不重视实践，理论建设和队伍建设是我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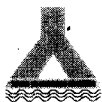


六、逐渐走向前台

我在《中国语文》主要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组稿审稿改稿，还把自己的一些好的料子贴进去。此外还起草简报、报告。常常为别人或者为集体整理、起草稿子。这是很好的锻炼。在座的刘艳春在这方面也受到了锻炼。我在为她的《语言交际》（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一书写序《〈语言交际〉的书品》里说：

2003年春天，原来我参加撰写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里的语法部分要修订，主要是比原来扩充十几倍。那时候我的视力很不好，我要刘艳春起草初稿。她根据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提供的许多实际语料以及别的材料，起草了七万字的稿子。有一次，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邀请有关的人讨论这部分稿子，我提出希望让刘艳春参加，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的领导非常欢迎她参加。刘艳春参加了这样高层的工作，也参加了这样高层的讨论。她的有效的研究工作，使她获得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现在大家看到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商务印书馆，2003）里的语法部分，是刘艳春起草的。

陈章太和我总主编了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我主编的其中第一本《应用语言学概论》就要付印了，马上要起草一个这一套书的总序。同样是2003年春天，我的视力很不好。陈章太提议我们再叫上周洪波周末到北京广播学院我的办公室里好好议一议，但是要有个人记录和起草。刘艳春做了记录和起草的工作。她又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刘艳春很快就写好了初稿，后来主要是陈章太修改，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总序。《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在《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3期上刊登的时候，陈章太问我要不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刘艳春起草



的，我说不用了，刘艳春不在乎这个。后来陈章太拿到稿费还是我们两个加上刘艳春三个人平分了。（4页）

我希望我的年轻的朋友在这些方面多得到锻炼。

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14年，我起初当了6年所长助理，后来两度当副所长，做了一些学术管理的工作。1994到1996这三年很重要。这三年我担任《语言文字应用》主编，工作的学术性更强了，读书和研究的时间也比较多，这期间完成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一书，书海出版社1996年出版。这是我走向前台的开始。

七、组织“语言哲学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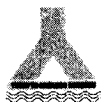
这是我走向前台的时候摸索共同学习和研究的路子。

1996年10月17日，我们开始了语言哲学对话。到1997年10月，第一轮告一段落。参加对话的大概有一百多人，说了话的并且发言进入书稿的有60人。成果是语文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的《语言哲学对话》。集中的成果是58个重要的见解，其中我参与提出来的有下面29个：

（一）语言最基本的，一是交际属性，二是社会的属性，三是兼有物质与精神的属性。特别是这第三点，更是语言的特点。这三个属性是相互关联的，这决定了语言的第二个层次的属性及其相互关联性。

（二）语言的基本部分也就是相对稳定的部分比较能产；而最能反映语言特点的，比较起来，还是语言里经常变化的部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相对稳定的部分的内部活动还更活跃一些，所以比较能产。

（三）语言的运动是开放的。从纵的方面说，语言是历时的产物，运动才能形成历时。语言的各个历时都是在一定的共时里的，各个共时又都是在一定的历时里的。语言是一个纵横交错、相邻部



分又动态叠加的系统。

(四) 语言是个开放的梯形结构。下面同一些动物语言交叉。人还要同比人低得多的机器说话。上面同人的更高的表现手段交叉。体态语并不都是低层次的，它是跨许多层次的，有的在很高的层次。

(五) 人是能影响语言的，不过，人要承担影响的后果。使语言更加健康、丰富、优美、文明了，人们要承担后果，使语言变得粗俗了，人们也要承担后果，而且群体很长时间承担后果。事先有一定的主动权、选择权，但是后果来了，阻挡不住，后果的影响也就是一种惯性。人们对待语言，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也很公平。种和收也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不想要豆子而要瓜，那么把豆子收了种瓜。

(六) 研究语言的人文性，更要善于设想、联想。更要用开放型、发射型的思维。更要历史的、立体的观察和思考，更要跨学科，更要重视语言里的差异和重视差异的规律。研究语言的人需要聪明。

(七) 人共振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使用语言，语言是含有意义的情况复杂的振动的巨系统。

(八) 人选择有意义的声、光作为语言来交际，也是在交际的过程中来选择的。

(九) 我们的语言观，最基本的是交际观。在交际这个语言的基本属性面前，任何语言学理论，任何语言学流派，任何语言学家，顺者昌，逆者衰，概莫能外。

(十) 意思不明了的不是静态，而是非交际态、无效交际态或者交际的不完全态。

(十一) 我们现在学校的语言教学，往往是模拟交际。我们学习语言，要学习交际里的活的语言，要尽量放在交际里学，学了要交际。交际要有一定的量，少了不行。长期进行不怎么准确的交际